

社
會
叢
書



馬克思主義 新論

蘇紹智 著

吾將上下而求索，雖九死其猶未悔……共產黨背叛了革命，老一輩左翼知識分子在飽受屈辱、折磨之餘，却未必改變當年追求理想的初衷。

本書是前中國社科院馬列毛研究所所長蘇紹智教授，在經歷文革與六四的磨難後，回歸馬克思的原典，批駁現實庸俗社會主義，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民主化前景的成果。

社會叢書⑪

馬克思主義新論

著者——蘇紹智

發行人——臧遠侯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393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二)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校對——黃加興・呂凱文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

定價——二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13-0449-2

Printed in Taiwan

000
A16
855

社會叢書 ⑪

馬克思主義新論

蘇紹智／著

ISBN 957-13-0449-2

目錄

序

——廓清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的遺毒

李金銓

5

自序

9

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

17

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

33

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

53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

79

編寫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若干問題

93

馬克思主義：堅持什麼？發展什麼？

115

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挑戰及其意義

127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

157

馬克思對訊息時代的預見

175

對外開放政策和馬克思主義

187

馬克思主義與保衛和平運動

——為國際和平年而作

191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 | 205

各種現實社會主義體制的比較和分類 | 217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係 | 233

布哈林國際學術討論會側記 | 247

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評述 | 263

布哈林的再評價

——寫在爲布哈林平反之際 | 275

誰有權判決誰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十週年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 | 303

附錄

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面目的大暴露

——評蘇紹智在海外的若干言論 | 馬理銘 | 315

「還是老實些好」 | 329

序

——廓清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的遺毒

李金銓

面臨蘇聯帝國的解體與東歐諸國未有的巨變，不禁想起假如馬克思從墳墓裏翻身再世，一定要撫然會心一笑。馬克思年輕時與普魯士的新聞檢查官堅決抗爭，毫不妥協——他根本就藐視穿制服的寫作班子；新聞自由就是新聞自由，在他來講是絕對不許有附帶條件的。馬克思最終的目的也就是要以自由民主來獲取人類徹底的解放。蘇聯、東歐和中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爲，與馬克思的激進人道主義背道而馳，其間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六十多歲那一輩的左翼知識分子，曾經死心塌地追隨毛澤東，爲的是反獨裁、反封建，跟蔣介石的「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進行鬥爭。毛澤東明白地說過：民主就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自由就是羅斯福所提倡的言論、宗教、免於恐懼和免於匱乏的四大自由。焉知毛澤東抓到政權以後，翻臉不認人，把中國搞得天翻地覆，幾乎瀕於萬劫不復之境。他背叛了馬克思，建立起「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毛澤東帝國^①。而一九八〇年代的開放改革期間，鄧小平的中國竟也始終在「政治反右，經濟反左」的矛盾圈中跳不出來，於是隔些時就穿插節目，先是「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又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七），結果終於以「六四慘案」（一九

八九）收場。其實，中共當局當真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首先得揪出尚未奪權以前的毛澤東來審問一番呢。

上一代這些卓越的知識分子，因為毛澤東背叛革命，背叛理想，背叛馬克思，讓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神州大地肆虐四十年，以致自己的身心備受折磨，但他們對當年的初衷似乎無悔無尤。

蘇紹智教授的這本宏著《馬克思主義新論》，正表現了這種堅持理想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蘇教授視野宏富，引經據典，公認是中國大陸學者中研究馬克思主義最卓然有成者。他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終因見解觸逆於當權教條派，被迫在「六四事件」後放逐海外。但他身在海外，心在中國，在知識與道德上承擔中國的苦難。知識分子手無寸鐵，造不了什麼反，但思想的滲透力卻遠比槍桿子來得深遠。本書匯集了蘇教授近年來在思想領域的碩果。

本書既然名為《馬克思主義新論》，自然有別於舊論。所謂舊論，便是毛澤東在中國實行的專制左傾冒進「史達林主義」。而新論乃是企圖從馬克思本人的原始著作裏尋找豐富的精神資源，庶幾批判性地繼承，創造性地發展，為中國的民主改革引導到一條康莊的理論大道。

馬克思曾經否認他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尤其反對人家死抓住他的若干觀點片面地大作文章。但馬克思的理論原來就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而在為革命實踐提供行動綱領。由於國情殊異，時代遞嬗，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各地發展出各種風格與論述，無法定於一尊。這不僅不足為奇，根本也是無可避免的，難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常常在爭吵誰是「真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粗有涉獵，主要還是靠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帶路。我想到阿爾土塞（J. Althusser）的論斷說，馬克思在年輕和晚年之間經歷了一場「知識論上的斷裂」，年輕馬克思深受黑

格爾哲學的薰陶，晚期的馬克思則以發展唯物辯證論的政治經濟學爲重心。果如是，則西方馬克思主義自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以降，乃至義大利葛蘭西學派，以及法國的結構學派和英國的文化學派，其主流殆爲致力於「年輕馬克思的再發現」。他們站在西歐的邊緣格局，堅持馬克思的「激進人道主義」，強調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一方面撻伐資本主義制度的不人道，一方面更嚴厲批判專制的「列寧—史達林主義」以及由之所引伸的現行庸俗社會主義。他們企圖在這兩條道路之外，另闢第三條充滿人道主義的蹊徑。

由於中國的歷史情境不能和西歐相提並論，蘇紹智教授的學術取徑也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迥然異趣。蘇教授在字裏行間十分推崇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所提倡的「新民主主義」，也就是中國第一步先要反帝、反封建和反資本官僚主義，第二步才談得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中間要過渡數十年。想不到毛澤東掌權後異想天開，專斷獨行，把中國搞成一個史達林加秦始皇的制度，歷萬劫而不復。當今中國首要之急不在搞血腥的階級鬥爭，而在於從事和風細雨的經濟建設，努力提高生產力（下層建築），並且要落實民主生活（上層建築），使兩者齊頭並進。蘇教授基本上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政治經濟學出發，力圖廓清史達林主義這四十多年來在理論與實踐上帶給中國的遺毒。本書內所收的〈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社會主義的再認識〉等三篇文章尤其擲地有聲，發人深省。其他各文對於馬克思主義亦皆有堅持，有發揮，有批判，莫不擊中要害。

本書的出版，正當大陸青年紛紛揮手告別馬克思主義之際，台灣青年則因受到資本主義情境的衝擊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濃厚的興趣，說來未始不是一場歷史的諷刺。

蘇教授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權威學者，我原無任何資格置喙。只因爲從中爲本書和台灣讀者接

緣，乃奉命略綴數語以助其興，固辭不獲，只好畫蛇添足一番。好在本書不會因而減色，何況蘇教授即將來明尼蘇達大學擔任希爾訪問教授，我借機聊表歡迎之忱，諒亦頗為恰當。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六日

註釋

①見 Ruān Ming, "Press Freedom and Neauthoritarianism: A Reflection o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阮銘原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部副主任，曾為胡耀邦撰寫許多重要文稿，一九八三年被開除黨籍。

自序

「思考、認識、再認識是令人痛苦的，但不要怕這樣做」

——米·謝·戈巴契夫

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種異常現象。它給中國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它幾乎把所有的中國人都捲入了這個漩渦，同時卻也使更多的人開始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問題。

在思考中，應該有一個認真剖析自己的科學態度。自己寫的文章，都擺在那裏。如果其中有賬，應該認賬，不能賴賬。賬是賴不掉的，無論在讀者面前還是在自己的心靈上，都賴不掉。剖開來清理一番，是對讀者負責，也是給自己今後的工作尋求新的起點，更好地為祖國的現代化事業增磚添瓦，避免重蹈覆轍。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被「揪出來」，靠邊站，沒有能夠寫什麼東西，看似無賬。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寫的東西，對於推動「左」的思潮，宣揚個人迷信，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呢？重讀那些曾被「革命小將」抄繳了去的舊作，再回想在大學講課的內容，不由得深感汗慚。那裏面簡直可以說很少表現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幾乎沒有獨立思想。那些作品往往是馬克思主義古典著作的引證和註解，黨的政策의 詮釋或首長講話之類的闡述或發揮，不但未能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

義的束縛，而且還促進了它，很難說是科學，沒有什麼保留價值。

我想舉一個例子，當然不是唯一的例子，但卻可以作為不應該忘記的教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當我在上海「解放」雜誌社工作的時候，人民公社正在推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開始時，「隊」指的是生產大隊，我奉命寫一篇文章，闡明生產大隊作為基礎是符合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不久，上面又說「隊」是生產隊了。於是，我又奉命寫另一篇文章，闡明生產隊作為基礎是符合這條規律的，好像前一篇文章根本沒有寫過一般。這種唯上是從，以致觀點出現多次大轉彎，卻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自己一貫正確的態度，是我國學術界的一種不良作風，浸淫至今，猶有存者。「六四」以後，更有甚焉。不過，也不能說我過去的文章都是奉命之作，而是和自己當時的「左」傾思想有關，一九五九年我曾主動寫過一篇文章：「人民公社運動是創造性地運用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的範例」（載《解放日報》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文中大肆宣揚主觀能動性，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毛澤東是創造性地運用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的大師，等等。實踐證明，無論是以大隊為基礎還是以生產隊為基礎，甚至連人民公社本身都是不符合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它們只能使得我國的農業生產一蹶不振，而我當時卻把它們闡述為「規律」。既是規律，便屬科學。但是，這種「科學」的解釋為什麼不能經受社會實踐的考驗！這種「科學」的生命為什麼那樣短暫！根本的原因是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科學，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去對待它，反而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政策或某一首長講話的註腳。事實上是把科學當作了政治的婢女。就我個人來說，恰如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中所剖析的，是「跟著上級講，跟著大家講」。宜乎其結果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了。

我國學術界的某些狀況，包括我自己以內，都是和中國知識份子的缺點分不開的。當然，中國知識份子是有優點的，如思想敏捷，憂國憂民，安貧樂道，潔身自好等等。歷史上和在今天也不乏直道而行之士，高風亮節之人，然而等待着他們的往往是坎坷的歷程，甚至是棍子、帽子，乃至牢獄。但是他們的優點往往和缺點糾纏在一起。中國知識份子的缺點又是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影響和建國以來史達林主義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其文化專制主義的影響。中國知識份子的缺點，以總體上說，就是軟弱性，在良知（用現代說，就是追求與維護真理）與當官或唯上的矛盾中往往唯上是從，唯當官與保官是從，而泯滅良知，難以有真正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想，更難以形成社會上獨立的階層，更不要說成為社會上的主體力量之一了。

在舊社會，「學而優則仕」，知識份子往往以「仕」為目的。有一位青年理論工作者告訴我，他用電子計算機統計「二十五史」中所提到的著名的知識份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當過官，儘管有的只是「七品芝麻官」，或者最後「不為五斗米折腰」而退居林下。「士」（知識份子）和「大夫」（官）結了不解緣，形成「士大夫」階層。這個階層不是獨立的，而是人身依附於皇帝和政府的。

到了本世紀，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是沒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的洗禮，沒有商品經濟的發展，沒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那種「人的發現」和思想解放。五四運動雖然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但卻是個「未竟之業」。這是因為，第一，不能期望當時的統治者會允許繼續推進和發展這個運動，對此不必多費筆墨。第二，原來期望中國共產黨會推進和發展這個運動，卻因為在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殘餘尚未被肅清的時候，史達林主義及其體制又被接受和推行，在意識形態領域深受日丹諾夫主義（實即文化專制主義）的影響，加以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

上出現「左」傾錯誤。這種「左」的指導思想在知識份子政策上表現得特別嚴重，致使思想解放多方受到阻礙，在建國以後，知識份子又陷入新的「唯上」狀態。

對知識份子來說，在建國之初，已經在以思想改造運動為開端的政治洗禮中進行過多次以扣政治帽子告終的「學術大批判」，它們打掉了知識份子所僅有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其後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並伴之以顛倒是非，政治圍攻，無限上綱，不容答辯的「學術大批判」，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鬥爭，直到一九六五年開始的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些政治運動中，先是黨外的，然後是黨內的，最後是全體知識份子的精英被打倒。中國的知識份子歷經磨難，到「文化大革命」中，知識份子被貶低到「臭老九」的地位。在「全面專政」的口號下，知識份子也成為專政的對象，文化專制主義達到極端，理論界只聽到「梁效」、「羅思鼎」、「洪廣思」（按：均「四人幫」所操縱的寫作組的筆名）之流的聲音，戲劇界只剩下八個「樣板戲」。真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在極度個人迷信的狂潮下，每一個人被要求成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執行」的「一忠」字的工具。

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之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打破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廣大知識份子汲取過去的教訓，本身開始認真反思。有一部份知識份子開始拋棄了「唯上」、「當官」、「聽話」的束縛，敢於「致良知」，追求和維護真理，試圖建立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想，成為思想解放的先驅，如黎澍、胡績偉、于光遠、王若水、李洪林、于浩成等較老的一輩，劉再復、李澤厚、嚴家其等中年一輩，還有大批青年一代，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不願跟著權勢的指揮棒而轉了，出現了可喜的局面。

但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展學術思想自由並不盡如人意，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不叫運動的運動，不叫學術大批判的學術大批判還是有的。其中大的兩次是「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七年）。這實質上仍是理論界少數領導人以黨的化身和馬克思主義純潔性自封，主觀判斷是非，憑藉行政的強制和「謊報軍情」，把不同學術觀點乃至正確的觀點上綱為政治錯誤，對一些知識份子進行處分，妄圖滅天下人之口，實行輿論一律，不少正直的知識份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幸的是，現在的學術理論界和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已經不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唯上是從，聽話的馴服工具，更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日夜原罪，任人宰割的奴隸。學術理論界和社會輿論決不在打棍子的人那一邊。手裏有真理的人不會打棍子，手裏有真理的人也不怕打棍子，一個俱有獨立人格和善於獨立思考，「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的新知識份子階層正在形成。雖然他們在「六四」之後遭到迫害，處境極為困難。新知識份子階層是中國改革和開放、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對於我來說，也是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變「唯上」為獨立思考，信條是「只向真理低頭，不向權勢屈服」。對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前途，對於祖國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前途，「吾將上下而求索」，「雖九死其猶未悔」。當然，由於中國知識份子背負的軟弱性的歷史包袱過於沉重，要求一下子擺脫這個局限性是不現實的。但是，儘管如此，「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事關國家的興衰續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危機和失敗，要求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認識，而不是輕易的否定和拋棄。決不能再把馬克思

主義當作盲目信仰的教條，而要真正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它。

但是，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由於蘇聯式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影響，一黨專政和文化專制主義的影響，特別是經過史達林的無以復加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本來是促進思想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被變成僵死的教條和束縛人們思想的緊身衣，把最高領導人的言論和解釋視為具有絕對權威的經典，學者們只能據此論證，不能獨立思考，思想束縛莫此為甚。一九八七年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主編B·C·謝苗諾夫在「哲學與生活」會議上的發言中，坦率地分析了蘇聯三十年代開始就影響蘇聯哲學發展，並決定其當今狀況和面貌的五種弊病：簡單化、專橫性、隨風倒、重條文和說教性。這五種弊病在我國「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早已存在，後來也未能排除其影響，到今天「六四」以後則變本加厲。

我通過「文化大革命」後對中國、對世界、以及對自己的思考，在研究民主化和改革的同時，研究和寫了若干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的文章。這些文章在一九八八年思想比較自由的時候，已經付梓，因「六四」而作罷。我在「六四」以後來到美國，又寫了若干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的文章，大多數文章曾在美國幾所大學和研討會上作過報告，明尼蘇達大學李金銓教授建議編輯出版，現在選出若干自認為比較可讀的文章，因為寫作的時間和背景不同，行文因之有異，讀者也不難從中看到我是如何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蹣跚前進，不時透露出舊的痕跡。

一九八八年底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是中共中央在近年來舉辦的一次規模較大的理論討論會，我在會上的一個發言引起軒然大波，「六四」以後被列為我的罪狀之一，因其具有歷史意義並希望讀者能知道我究竟講了什麼，講的是不是實情，所以選入本

書。另外，將《人民日報》以馬理銘爲筆名的一篇批判我的文章，以及爲澄清某些個別事實，我寫的一篇短文也作爲附錄；有比較才有鑒別，我相信讀者會從中得出正確的判斷，我相信：

真理必將戰勝強權

正義終於掃除邪惡

我這裏應感謝美國馬凱特大學民主與公共價值研究所給我提供研究的機會，感謝時報出版公司孟樊先生安排本書的出版，各種形式的批評和評論都將受到我的重視和感謝。

蘇紹智於美國馬凱特大學，一九九〇年歲尾